

《金藏》興國院本與廣勝寺本 《毗沙門天王經》對勘*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教授 萬金川

摘要

「趙城金藏」之名，若是僅就該一藏經的發現地點來說，這個名詞本身並無問題。然而，若是將「趙城金藏」一詞所指涉的對象視同《金藏》來看，或許就有商榷餘地了。事實上，從版本學的立場來說，存世的《金藏》是由四種刷印時間前後不一，而所依經版或新或舊的印本所構成的。這四種印本分別是「興國院本」、「天寧寺本」、「大寶集寺本」與「廣勝寺本」。此中，真正可以稱之為《金藏》的，其實只有「興國院本」與「天寧寺本」。至於「大寶集寺本」與「廣勝寺本」，則是元代初年大肆修繕《金藏》原初版片之後的刷印本。換句話說，若是就彼此所依版片的修補與否來看，則「大寶集寺本」與「廣勝寺本」或許都只能算是《金藏》的元代遞修本或配補本。由於《金藏》的「興國院本」與「天寧寺本」，今日倖存於世者不足二十卷，而元代刷印的「廣勝寺本」中，卻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卷帙是出自入元之後的補版。儘管學者之間的研究曾經指

* 本文為特約稿。

出，元代的補版工程頗為草率；然而，令人稍感遺憾的，這些研究之中只有極少數是建立在印本之間的詳盡對勘上面。本文將以《毗沙門天王經》為例，透過逐張逐行的印本對勘，而嘗試查明該一經本的金代原刊本及其元初修補本之間，是否有其重大差異，並且也嘗試去說明這種差異的存在所可能具有的意義。

【關鍵詞】

金藏、興國院本、趙城金藏、廣勝寺本、毗沙門天王經、版本對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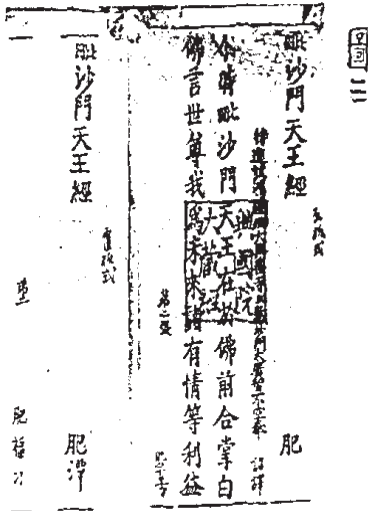


與「宋刻宋印」的《思溪藏》有所不同的，今日學界所謂的「趙城金藏」或「金趙城藏」，實際上是一部金代開雕而又歷經元代補版的遞修本藏經，¹雖然就其版式以及收經架構來說，這部藏經還是一仍《開寶藏》咸平初校本的舊觀而無所改易。²有關這部藏經的遞修性質，其實

¹ 近年以來，譬如張德光 2006:35-37 便曾呼籲學界，應該要把金代原刻的《金藏》與元初補雕的《金藏》予以區別，該文並且認為當年廣勝寺所發現的《金藏》大體皆屬元代刷印，署為《金藏》或趙城《金藏》而不加但書的做法，並不恰當。然而，如此一來，真正稱得上原刻初印的《金藏》，或恐所剩無幾。筆者以為，若以蔣唯心當年檢勘而號稱近五千卷的「趙城金藏」而論，其間既有金雕金印的經卷，也有金版元印的本子，以及元初補版而後刷印的本子，而後者則幾近全藏四分之一（學界之間則將後兩種統稱為《金藏》廣勝寺本）。再者，就版本學而言，所謂「補版」是對殘損磨滅的書版進行修補，而這種修補既可以指「在原來殘損的書版上進行剝改修補」的「修版」而言，也可以就「另行補刻業已磨滅的書版以配補原版其他版片」的「補版」來說。總而言之，不論修版或補版，舉凡書版經過這類修補手續而刷印出來的本子，它們在版本學上通常都稱之為「修補本」，而一旦跨越朝代，往往又被稱為「遞修本」。至於有關《金藏》的元代補版，蔣唯心 1935:13 除了指出「元初補刻經版，於載籍亦有可稽」之外，同時並引祥邁奉敕撰述的《至元辯偽錄》卷四以為證：「大元啟祚，睭意法門。太祖則明詔首班弘護茲道，太宗則試經造寺，補雕藏經。」

² 關於《金藏》的版式及其收經架構是全面依照《開寶藏》咸平初年印本而來，參見呂澂 1943:5、李富華 1991:11-13。此外，諸如《金藏》廣勝寺本奄帙《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卷一卷末所出「大宋咸平元年奉/勅雕」的牌記（參見⊕67.84a），其實

蔣唯心 1935:6-7 業已明白指出了：



所見興國院本凡十卷，成字帙大般若經卷二百六十九及肥字帙毗沙門天王經各有一複本，尤關重要。以兩複本對校，即見興國院本字跡整齊而別一本草率，興國邊題完全而別本簡略(如第幾張但作第幾，某字號但作某字)，興國不記刻工，而別本隨處附記。加以刻技印紙等等之比較，可斷言興國院本版式為原刻，別一本版式為翻刻(附圖三)。余憑此標準，分疏廣勝寺全藏底版

已經清楚說明了《金藏》的這種翻造乃至覆刻的性質，而前掲牌記「奉」字下所出「太原府彫經僧 九濟 處定刁」的長方形墨圍，其實也說明了該一經卷的第一卷所依經版正是元初之際補雕而成之物。

為原刻與補雕兩部以探索之，其雕造事實乃始末畢見矣（補雕之名即出於此類版片題記……）。³

在有關《金藏》的研究史上，不難發現，前揭蔣氏之文早已成為一座高聳的路標，不斷指引其後繼者的相關研究。⁴儘管如此，不可諱言的，蔣氏當年孤身一人，以四十天的時日而查勘將近五千卷的大藏，因其不及細究而留下來的若干疑團，目前為止，似乎仍然沒有得到應有的廓清。以蔣氏文中所提及的「原刻」來講，毋庸置疑的，它指的就是金代開版同時也是金代刷印的《金藏》興國院本與天寧寺本；⁵至於蔣氏文中所謂的「翻刻」，今日學者則

³ 繼蔣唯心 1935 之後，李富華 1991:3 則更進一步指出：「在現存廣勝寺本中，還有其他印本，如《說無垢稱經》卷 2 等 7 種重卷複本，它們雖無興國院本那樣特殊的印章，但與大多數印本仍有精粗之分，我們姑且把它們看作《金藏》的初雕印本，即《金藏天寧寺本》。」（童瑋 1989:24-25 也有類似敘述）此外，依周伯戡 2003:218 對台北·國家圖書館所藏《付法藏因緣傳》卷二的書誌學描述，這個卷子應該也是屬於所謂的「金藏天寧寺本」。

⁴ 這一點可以從日後諸如宿白 1964、童瑋 1989 以及李富華 1991&2012 等相關論著，或襲用其說，或徵引其文，乃至依循其文後所附「廣勝寺大藏經簡目」而嘗試還原《金藏》目錄中清楚見出。

⁵ 蔣氏前揭文頁 6 提及了這種「臘黃紙印本，卷軸較大，首蓋『興國院大藏經』方形朱印」的興國院本，並且還依這些經卷所出牌記而斷定它們是金代印本。此外，蔣氏前揭文也說及了他本人曾親炙 10 卷這種經本，儘管如此，在重新檢索之餘，李富華 1991:3 則認為目前僅存 8 卷而已，甚至蔣氏文中所提《千臂千鉢經》卷 3 與《大

多以「《金藏》廣勝寺本」稱之。⁶然而，根據蔣氏文中對「別本」《毗沙門天王經》的版式描述來看，顯而易見的，蔣氏所謂的「翻刻」，並不是指嚴格意義上的「覆刻」或「影刻」，否則便不會有一本字跡整齊而別本草率，乃至兩本邊題有其或全或略的差別。換句話說，蔣氏所謂的「翻刻」，充其量只能算是依其底本原式而刊造的「重刻」（如果當年曾經重新開版雕造此一經本的話）。並且，就此一「重刻」在版端邊行小字上的改動來說（此一改動既有可能是藉剝補舊版而著手，也有可能是緣於版端受損而以新舊版片拼綴的方式而重新雕造其邊行），這個版式所刷印出來的印本，若是稱為「修補本」，或許會顯得更為恰當（就版本學而言，書版的補刻、翻刻與影刻是有其分別的）。⁷

般若經》269卷，早已不知去向。至於台北·國家圖書館所藏興國院本《大般若經》572卷等三件《金藏》印本，應該也是當年廣勝寺流出之物。

- ⁶ 1959年《金藏》的另一種印本在西藏薩迦寺的北寺圖書館為宿白等人發現，並且認為這批印本也是元初歷經補雕之後的印本。此外，根據經卷所出牌記，這些印本原初是被供奉在燕京大寶集寺，而「《金藏》大寶集寺本」之名也於焉誕生（以上參見宿白1964:15-17）。
- ⁷ 蔣氏之文或以「原刻」與「翻刻」對舉，或以「原刻」與「補刻（雕）」並稱。由此可見，蔣氏文中所謂「翻刻」，實指「補刻」而言。至於蔣氏所言之「補刻」或「補雕」，實際上，指的就是「修版」與「補版」。雖然就版本學而言，所謂「翻刻本」或「重刻本」，依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編》第四章所云，乃指「以原刻本為底本，如式刻版再印」者稱之。至於「影刻本」或「覆刻本」，依程、徐兩人前揭書，乃指「翻刻本採用影摹寫樣上版的方法，刻

質而言之，依照前揭蔣氏之文的語脈來看，其人所謂的「翻刻」，實際上，就是指「補雕」或「補刻」而言。蔣氏前揭文在「先言原刻」之後，隨即在頁 9 以下而有「次言補刻，數約全藏四分之一，而年月題記極少」的記述。進而便牒引《金藏》廣勝寺本所收《四分律》卷 2、卷 5 等處跋文以示其「補雕」一語的出處：「宣差大名府路達魯花赤納憐蒙古提舉補修雕造」（文見⊕40.257b）並且，他更指出入元之際的這項「補雕」，在性質上「屬於補修而非續刻」。換句話說，蔣氏之文認為當時的這項「補雕」工程，並不是著眼於刊刻《金藏》的續藏而是在於所謂的「補修雕造」。

然而，蔣氏此前牒引《四分律》卷 2 跋文中所出「補修雕造」一語，至少可以容許兩種不同的解釋：其一指「補修尚可使用的經版並重新雕造不堪使用或業已毀失的經版」，換句話說，就是指「修版」與「補版」而言；其二指「完足經版的雕造以補圓全藏」。⁸ 儘管如此，不論這

印得同原刻本一模一樣」。學界或有一說，認為當年《金藏》的雕造，乃是直接以《開寶藏》的紙幅為其版樣，反貼上版開雕而成的「覆刻本」（李際寧〈趙城金藏流傳始末〉，www.ccdy.cn，2009-05-10 07:48。除此而外，方廣錫 2015:8 也認為《初刻高麗藏》以及《趙城藏》的大部份經本都是以這種方式覆刻《開寶藏》而來。然而，刊刻大藏乃為累積功德，如此直接以藏經紙幅反貼上版而開雕，不正是一種毀經的行徑嗎）。

⁸ 雖然目前多數學者悉皆採取前一種說法，一致認為《金藏》在元代初年確實曾被修復過或補充過。儘管如此，張德偉 2014:24 卻出人意料地指出前揭這種「補修雕造」之說，乃屬臆測之辭(surmise)，

項元初之際的補雕工程是鑑於「十年天下滿兵埃，可惜金文半劫灰，欲析微塵出經卷，隨緣須動世間財」⁹的窘境，或是為了要繼續完成金宣宗貞祐二年以降，「門人法澍，再尋良匠，重錄聖賢，未圓備間，大兵又進」¹⁰的未竟之業，個中詳情，本文不擬討論。總而言之，在某種程度上，入元之後的《金藏》版本已非昔日天寧寺乃至太陰寺時期的舊觀，這一點則是可以肯定的。質而言之，本文所關心的，乃是歷經「補修雕造」之後的《金藏》印本之中，有哪些印本的經版曾經修繕整理過？而哪些印本的經版是重新開版雕造的？¹¹並且，在這些修版與補版的工程之

並且認為《金藏》入元之後的「後續計畫，至少有一部分並不是更換戰火中受損的版片，而是去完成該一藏經此前的未竟之業。」換句話說，張氏之文顯然採取了類似「補修雕造」一語的後一種解釋，而主張《金藏》的全藏完刊乃是入元之後的情事。

⁹ 文出耶律楚材〈補大藏經版疏〉，收於氏撰《湛然居士集》卷 14（文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1 冊，集部 130·別集類，頁 625 上）。

¹⁰ 文出「雕藏經主重修大陰寺碑」：「〔慈雲〕更向絳縣張上村中，構修堂殿，印造藏經。貞祐二年（1214 年），天兵至此，殿堂灰燼，賢聖煙飛，鬼哭神號，山鳴海沸。門人法澍，再尋良匠，重錄聖賢。未圓備間，大兵又進，槍刀彙怒，人馬蜂喧。」（引自王澤慶〈解州版《金藏》募刻的重要文獻—雕藏經主重修大陰寺碑考釋〉，文物世界 2003 年第 4 期，頁 17a）

¹¹ 李富華 1991:7 在說明大寶集本與廣勝寺本同為初刻於晉南而後補雕於燕京弘法寺的《金藏》印本時，曾以這兩個元代印本有其相同的刻工題記以及特殊版刻記號為證，來闡明這一點。李氏之文所提及的特殊版刻記號，是否便是用以標示那些元代補版或重新開雕的

間，是否也同時進行了經文內容的某些校改？

蔣氏文中所提及的興國院本《大般若經》269 卷，日後顯然下落不明，因為《中華大藏經》(⊕3.605b-613b)所採用的經卷則是本身殘破漫漶的廣勝寺本，而這也迫使主事者必須以部分大寶集寺本以及部分再雕本《高麗藏》的該一經卷進行配補。¹²在這種情況下，今日當然就難以查覈

經版？這一點我們並不清楚。但是這些款式頗多的特殊版刻記號，的確可以在大寶集本與廣勝寺本的若干經卷裡見到。譬如大寶集本《大般若經》卷 95 第 18 張第 4 行「受真如求」下方接連出現「卐、卍」(⊕1.927a4)，同卷第 19 張第 4 行「空識界真如求」下方也接連出現「卐、卍」(⊕1.927b4)。再如廣勝寺本《法句喻經》卷 1 第 1 張第 3 行「無常品第一」下方也有「卍」(⊕52.183b3)，而同卷第 19 張第 4 行「偈言」下方也接連出現「卐、卍」(⊕52.189b4)。此外，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藏廣勝寺本《大般若經》卷 417 卷末也有「卍」，以及《大方便報恩經》卷 2 第 13 張第 3 行「此滅為樂」下方也接連出現「卍、卍」。此中，以「卍」字版刻記號來說，李際寧 2007:52-53 在釋讀「旅順博 027881.13.2 號殘片」時，曾經指出：「頁面文獻空白處刊雕『卍』字符號等小花，這是明確的元代風格」。

¹² 參見⊕3.613b 卷末校勘記。廣勝寺本的該一經卷日後所以殘破漫漶的原因，應當和當年搶救該一藏經之餘，竟將它們貯放在業已廢棄而過於陰溼的煤窑礦窟有關(參見李際寧〈趙城金藏流傳始末〉一文)。至於興國院本《大般若經》269 卷的下落，或許在蔣氏勘覽之後不久便為人所盜賣(據李富華 1991:2，在蔣氏為文揭露了廣勝寺的大藏之後，由於寺方管理不善，偷竊盜賣之事迭有發生，以致於有高達數百卷的經卷流散出去)。

蔣氏之說的恰切與否了。¹³幸運的是蔣氏文章中所提及的《毗沙門天王經》，其興國院本與廣勝寺本並存而具收於《中華大藏經》(㊦65.669b-671b/ 671c-673c)。這便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窗口，而得以檢視唯心先生此前對這兩個印本的描述是否足夠周延。

整體而言，除印經紙一項基於客觀條件而難以實際比對之外，其他蔣氏所述及的各項特徵幾乎都可以逐一驗證。就版端邊題小字而言，除興國院本第 6 張邊行小字「第」以下以及第 7 張因不明原因而未見印出之外(㊦65.673bc)，¹⁴兩本之間的差異恰如蔣氏所言，興國院本邊題完整而廣勝寺本簡略，興國院本不記刻工，而廣勝寺本則版版皆於邊題千字文帙號下方附記刻工。至於蔣氏所云「興國院本字跡整齊而別一本草率」以及兩本之間的刻技高下。對於這一點，我們的看法則有所保留。至少在《毗沙門天王經》

¹³ 所幸周伯戡 2003:224-225 曾經著手對勘台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 572 的興國院本與大寶集寺本，並且在「仔細對照兩本經文之雕刻，文字字形、刻法、排列」之餘而斷定大寶集寺本使用的經版是元代修繕過的舊經版而非新雕，雖然這項補雕工程顯得相當粗糙。

¹⁴ 印本一旦出現這類現象，若非經版本身受損而出現問題，便是施墨不勻或刷印失當的結果。從本經興國院本第 6 張版端邊行小字「第」以下以及第 7 張版端邊行全然未見印出，乃至廣勝寺本版端邊行小字的大幅更動，多少可以見出本經版片右側一邊曾經受損而被重新修整過。

的興國院本與廣勝寺本之間，實在看不出來唯心先生文中所謂「一本字跡整齊而一本字跡草率」的分別。其次，除了廣勝寺本第 7 張部分版面可能出於元代補版之外(參見文後附圖)，該一經卷其他各張，應該都是襲用了和興國院本同樣的一副經版刷印而來，雖然其中也有若干字體明顯經過了補治與修繕。至於兩個印本之間的差異，乃在興國院本是「金刻金印」而廣勝寺本則是「金刻元刷」，並且後者所據以刷印的經版，由金而元，歷經了將近半個世紀的時光，即使倖免於刀兵水火之厄，也終難掩其歲月痕跡，或木蠹而害，或碰撞而損，或日曬而裂，或雨淋而蝕，乃至因積年墨垢而致使字跡漫漶，不一而足。因此，刷印之前的版本整頓乃至補版修繕，實屬經坊或書坊之間的常態性作業，實不足奇。¹⁵

再者，如果暫時排除若干漫漶不清而難以辨識之處(譬如第 6 張 20 行「齶」下小字夾注右行，興國院本作「區字」，廣勝寺本作「區𠃉(=起?)」)，以及或因其刷印失當而難以比對的地方(譬如第 6 張 23 行，興國院本「𦉳」字下小字夾注右行作「二合」，

¹⁵ 整體而言，廣勝寺本的筆畫似乎較為輕瘦而興國院本卻相對肥厚，這可能是因於版片文字經刮削整治後而顯現出來的效果，不足為怪，也不能以此而論定兩者經版有異。當然，諸如 **啣啣**_{672a17/669c17} 的筆跡差別，兩本之間也是所在多有，並且這種筆跡出入的情況在第 7 張上顯得尤為頻繁(前為興國本，後為廣勝本)：**結結**_{673c5/671b5}、**頭頭**_{673c8/671b8}、**結結**_{673c10/671b10}、**咒咒**_{673c12/671b12} 乃至 **如如**_{673c17/671b17} 等等，這也是我們推測廣勝寺本第 7 張有可能是依原初壞損嚴重的舊經版而重新補雕的主要原因。

廣勝寺本「縛」字下小字夾注右行作「二」。此中，興國院本的「縛」字有可能因刷印失當而使其左上的「口」字未見印出，而廣勝寺本「二」字下留有一字餘地的空白而未見「合」字，這可能也是刷印失當所致，當然也有可能是補版之際未竟全功所造成的)，興國院本與廣勝寺本之間有兩處異文值得留意。其一、第 2 張第 7 行，興國院本作「受掙」，廣勝寺本作「受持」(存世諸本皆作「受持」，而廣勝寺本將「掙」改作「持」，則可見出，入元之際的《金藏》補刻，同時也進行了經文校正)。其二、第 6 張第 23 行，興國院本作「冒……婆縛二合引」，廣勝寺本作「冒……婆嚙二引」(存世諸本皆作「冒……婆嚙二合引」。廣勝寺本或將「縛」字改作「嚙」，但卻又將「冒」字錯作「胃」而產生新的誤訛。總之，入元之際的《金藏》補刻，同時也進行了經文校勘，這一點則是可以確定的)。

以上兩例都是「補刻本」校正「原刊本」而出現的異文。除此而外，以下數處異文更值得特加關注。其一、第 3 張第 1 行末三字，興國院本作「所告父」(宋元明三本與麗藏本皆同)，廣勝寺本則作「所向父」(石經本同)。其二、第 5 張第 21 行，興國院本作「白」(存世諸本皆同)，唯有廣勝寺本獨作「曰」。其三、第 6 張第 17 行第二「野」字下右行小字夾注，興國院本作「一」，並於次行「野」字下小字夾注左行標注「二」，而廣勝寺本此處無小字夾注，並於次行「野」字下小字夾注左行標注「一」。由此可見，廣勝寺本此處若非補版有失，便是新刊有誤。其四、第 7 張第 3 行，興國院本作「右指」(宋元明三本同)，廣勝寺本

作「名指」(石經本與麗藏本同)。就前揭第一處異文來看，廣勝寺本「所向父」的「向」字頗有剗改之嫌，¹⁶同樣情況也見於第四處異文，廣勝寺本「名指」的「名」字也同樣有剗改的嫌疑。¹⁷從以上幾處的異文出入來看，入元之際的「補雕」工程，除了修治乃至重雕受損的經版之外，同時也進行了經文的校正。並且，從異文類型上來看，廣勝寺本兩處異文皆同於石經本，這多少也暗示了與「房山石經·遼金刻經」關係密切的「契丹藏」有可能是主事者用以入校的參校本。¹⁸至於前揭第二處廣勝寺本獨有的異文，可能只是出於主事者補版的一時失察而已。

依蔣氏前揭文，興國院本《千臂千鉢經》卷三第 1 張

¹⁶ 廣勝寺本此處「向」字書作向^{670a1}，它與兩本之間所見「向」字的書寫風格明顯不同。興國院本與廣勝寺本所出「向」字凡三：廣勝寺本分別書作：向^{669c11}、向^{671b4}、向^{671b4}；興國院本依次書作：向^{672a11}、向^{673c4}、向^{673c4}。

¹⁷ 廣勝寺本此處「名」字書作名^{671b2}，它與兩本之間所見「名」字的書寫是有其些許有出入的。興國院本與廣勝本所出「名」字凡二，廣勝寺本分別書作：名^{670c23}、名^{671b8}；興國院本依次書作：名^{673a23}、名^{673c8}。

¹⁸ 「房山石經」(第 25 冊，頁 189b-192a)收有俠字號，金朝時期奉聖州(今河北涿鹿)保寧寺僧玄英及其俗家弟子史君慶等募資刻造的《毗沙門天王經》。從其 1 版 28 行，行 17 字的行款來看，則與應縣木塔所出「契丹藏」頗相一致。並且，相傳主導元初《金藏》補雕事宜的耶律楚材，原本就是入仕金朝而降於蒙古的契丹族人；因此，元初之際的這項《金藏》補雕工程或有可能以北方一系的藏經入校(如果當時「契丹藏」零本仍然倖存世的話)。

出有「大金大安元年己巳歲睢州考城縣太平興國禪院，建修十方常住雜寶藏經，看檢高流切須護惜……」的牌記(案：⊕67.93a-99b 所收本經卷三則為廣勝寺本。並且，依卷後校勘記，本卷 93b-94a，廣勝寺本或缺或殘而以麗藏本配補。由此可見，蔣氏當年所見本經卷三目前業已不知去向)，則可以清楚知道興國院本在 1209 年之際，已然迎入太平興國禪院。至於廣勝寺本，李富華 1991:10-11 根據廣勝寺本《放光般若經》卷三所出「趙城縣祖代經方(坊)寵待詔自造，汾西縣主坐老待詔，中統三年九月十五日記」的卷尾墨書附記，也可以確知 1262 年之際，廣勝寺本的刷印業已竣工並送抵趙城縣龐家經坊裱裝完成而供奉於廣勝上寺。換句話說，這兩個印本的刷印時間相差了將近半個世紀。就此而言，宿白 1964:17-18 在對勘《金藏》大寶集本與廣勝寺補雕印本之際，發現兩個補雕本之間也有所出入而指出：「此蓋兩補雕印本印造時間不同所致。舊版遞修，不同時期的印本之間，殊多差異，斯為我國古代雕版印刷之通例也。」如果宿白此處所謂的「舊版遞修」，既指經版的或修或補而同時也指經文的校正，那麼《毗沙門天王經》興國院本與廣勝寺本的諸種差異，或許就是「原刊本」與「修補本」或「金代原版」與「元初補版」之間

一個絕佳的對照性個案！¹⁹



¹⁹ 針對傳統古籍「原刊本」與「覆刻本」之間或異或同的問題，喬秀岩、葉純芳 2018:53 在其論及〈古籍整理中的存真標準問題〉的論文裡，就曾經針對古籍的「傳統複製」而認為：「南宋初期覆刻北宋本也有很多校改的地方，雖然沒有任何說明。從文字校改這一點看，可以認為他們製作覆刻本的目的不在單純地保存原刊本的原始風貌，這跟照相是不一樣的。」（又，在前揭論文的隨頁腳注裡，作者說：「為行文方便，本文對覆刻本、影刻本、摹刻本、仿刻本等詞彙的不同含義不加區別，一概用『覆刻本』這一廣義的概念。」）

【附圖】

興國院本《毗沙門天王經》第 7 張一取自⊕65.673c

賀十引

我今說根本印以二手右押左內相
義豎二右指頭相合屈二頭指如鈎
若迎請時向身招若發遣時向外撥
念誦時結印當心誦七徧即頂上散
然後取念珠專注念誦

次說吉祥天女身印二手虛心合掌
開二頭指二中指二無名指屈如蓮
華形二大指二小指堅合若念誦時
當心結誦真言七徧頂上散毗沙門
天王經中

毗沙門天王呪曰

那謨裴鑠羅嚩擊寫一摩訶曷囉闍
寫施鞞_二娑婆訶_三施嚩跋跌梨娑
婆訶_一

若呪淨油七徧二七徧用塗臥所乞
財物等得如所願

毗沙門天王經

廣勝寺本《毗沙門天王經》第 7 張一取自⊕65.671b

賀十引

我今說根本印以二手右押左內相
義豎二名指頭相合屈二頭指如鈎
若迎請時向身招若發遣時向外撥
念誦時結印當心誦七徧即頂上散
然後取念珠專注念誦

次說吉祥天女身印二手虛心合掌
開二頭指二中指二無名指屈如蓮
華形二大指二小指堅合若念誦時
當心結誦真言七徧頂上散毗沙門
天王經中

毗沙門天王呪曰

那謨裴鑠羅嚩擊寫一摩訶曷囉闍
寫施鞞_二娑婆訶_三施嚩跋跌梨娑
婆訶_一

若呪淨油七徧二七徧用塗臥所乞
財物等得如所願

毗沙門天王經

廣勝寺本 第七 祝 福 事 了

參考資料

- 張德光 2006，〈關於趙城《金藏》研考中幾個問題的商榷〉，收於《文物世界》2006年第1期，頁33-37。
- 蔣唯心 1935，《金藏雕印始末攷》，南京：支那內學院，1935年。
- 呂 澂 1943，〈宋藏蜀版異本攷〉，收於《圖書月刊》，1943年2月第2卷第8期，頁3-7。
- 李富華 1991，〈《趙城金藏》研究〉，收於《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頁1-18。
2012，《金藏目錄還原及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 周伯戡 2003，〈記國家圖書館所藏三件金藏佛經〉，收於《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8期，2003年，頁213-228。
- 宿 白 1964，〈《趙城金藏》和《弘法藏》〉，收於《現代佛學》，1964年第2期，頁13-22。
- 童 瑋 1989，《趙城金藏與《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李際寧 2007，《佛教大藏經研究論稿》，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2009，〈趙城金藏流傳始末〉，見 www.ccdy.cn，2009-05-10 07:48。
- 方廣錫 2015，〈第三種遼藏探幽〉，收於《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3期，頁1-9。

張德偉 2014, *An Unforgettable Enterprise by Forgotten Figures: The Making of the Zhaocheng Canon* 趙城藏 in North China under the Jurchen Regime, 收於 ZINBUN (2014), 44: 13-50。又、張氏前揭論文的中文譯文則以〈湮滅之人與其不朽之業：在女真金代佔領下的中國北方刊印《趙城藏》〉為名，發表於《漢語佛學評論》第六輯，2018年，頁 118-153。

王澤慶 2003, 〈解州版《金藏》募刻的重要文獻—雕藏經主重修大陰寺碑考釋〉，收於《文物世界》，2003年第4期，頁 15-19。

喬秀岩、葉純芳 2018, 《文獻學讀書記》，北京：三聯書店，2018年。